



参 考

Reference Information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领导决策服务资料汇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图书馆编

第一期

导 读

2008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即 26 号令，对独立学院转设给予了五年过渡期。如今，五年过渡期限已到，全国 300 余所独立学院这一庞大群体的命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期《参考》精选了 4 篇文章分析了独立学院的现状，解答了独立学院的困境，提出了独立学院的对策。

教育界从来不乏风云人物，如果说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是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异数，那么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则是中国民办教育家的代表。《参考》选登了朱清时、俞敏洪两位高校领导的采访，展示了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办好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有优秀的师资。可是，近日全国不同地区都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件，对此《参考》为您深入解读。

图书馆是高等院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重硬件投入、轻教师作用的发挥，不积极建设软环境，反映出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发展教育的思路还十分粗放，这非但不利于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反而会制造急功近利、形象工程、铺张浪费。说到图书馆，就不能不提到博物馆。成都正在打造“博物馆之都”，让我们一起，在成都的博物馆中穿行，体味巴蜀文明的沧桑变迁。

目 录

独立学院发展路在何方	1
独立学院，找准自身定位是正道	3
独立学院难“独立”	6
“断奶”期至广东独立学院无一单飞	14
图书馆不是用来评估的	18
尊重教育行业 保障教师工资	20
朱清时：在可以范围内，我能做的都做了	22
俞敏洪：有生之年打造中国最好的民办大学	26
“叛逃”教育工厂	29
穿行博物馆 看成都千年	35

独立学院发展路在何方

独立学院转设五年过渡期限已到，全国 300 余所独立学院的命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两会，独立学院转设是政协关注的一大热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产物，独立学院自 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以来，已走过 10 多年的发展历程。该制度设计既成功嫁接了公办高校的品牌优势，又充分发挥了民间资本的资金优势，从办学伊始就实现了高起点、跨越式发展。据 2012 年教育事业统计，全国有独立学院 303 所，占全国本科院校数的 26.5%，在校生 278 万人，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1/5。

2008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即 26 号令，对独立学院转设给予了五年过渡期。如今，五年过渡期限已到，全国 300 余所独立学院这一庞大群体的命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不了解独立学院的人可能不知道，独立学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纷。有的母体高校从独立学院提取学费收入的 15%-40% 作为巨额管理费，导致独立学院后续资金不足，生均办学成本降低，后劲乏力。独立学院转设时，有的母体高校要收取 1 亿多元“分手费”，影响了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一些不负责任的公办大学在利益的诱惑下，举办“校中校”，背离了举办独立学院的初衷。

当前，对独立学院规范工作，不少省市并未出台相关落实政策。有的独立学院引进了社会资本，但占地面积、办学条件离相关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大部分独立学院的资产没有过户，大多数“国有民办”独立学院没有自己独立的校区，办学指标无法达到普通高校的设置条件。

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许多独立学院还在观望等待。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独立学院健康规范发展的角度，我建议政府对独立学院要做到两个“规范”、一个“扶持”。

规范整治“校中校”。部分公办高校利用校办企业、校友会、基金会等公办资源开办“校中校”，借政策之名搞“假独立”和变相双轨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办学形式是公办高校的“翻牌”，不但稀释了公办教育资源，影响了公办高校教学质量，还恶化了民办高校的生存环境，影响了教育公平。由于“校中校”可以为公办高校带来额外收入，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往往视而不见，这不仅助长了教育腐败，而且损害了政府和名校形象。对于此类办学形式，必须加强管理，予以规范，使其回归母体高校或终止办学。

差异化规范。由于独立学院办学主体多元、合作形式多样，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独立学院的特点，给予差别化规范。对于“国有民营”独立学院，支持其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找到有实力的企业作为投资方，做到独立法人、校园、教学、财务、招生、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7个独立”后，继续以独立学院形式存在。对于由企业投资创办、民营资本占主体的“民有民营”独立学院，支持其对照标准，完善条件，转设为完全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对于优质公办高校和民营资本、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办的“混合所有制”独立学院，要积极扶持，促进其快速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对于部分由母体高校自身创办、无法完成评估验收的独立学院，鼓励其“回归”母体高校或逐渐减少招生，终止办学。

此外，政府还要在校园建设、资产过户、法人登记、公共财政等方面给予独立学院更大力度的扶持。（作者胡卫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14年03月10日

独立学院，找准自身定位是正道

教育周刊:独立学院在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按照 26 号令规定,独立学院转设“孵化期”已过,那些没有进行转设的独立学院,面临怎样的发展命运?

甘德安:独立学院十年风雨,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是民间办学的百年机遇,是在公立大学一统江湖的局面中撕裂的一个口子,它为中国高等大学的布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随着其规模增大,气候渐成,也增加了不少选择机会。2012 年,独立学院已经占全国本科院校数的 1/4 强,在校生近 20%,5 位本科毕业生就有一位是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其二,独立学院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没有一所大学的城市,有了独立学院就有了本科大学,可为地方发展带来诸多资源;三是,有利于分层培养,即重视一些低分高能的学生,而不是培养那些眼高手低的学生。

但独立学院在更多、更好、更不同方面的使命还任重道远。

10 年前,我曾说过,独立学院不独立,死路一条;“乱独立”怨声载道,依法独立,金光大道。所以,那些没有达到转设标准的独立学院这两年要抓紧创造条件,而不是创造虚假数据。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要求下,要么办好大学,要么办死大学,这与是否民办已不太相关了。而“办好”与“办死”的一个区别就是,在办学条件达标后,就看其办学定位是否合理。

教育周刊: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本科院校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甘德安:如果说挑战,首先涉及的就是独立学院的定位:是营利性办学,还是非营利性办学。如今,公立大学衙门化,民办大学逐利化已遭人诟病。衙门化作风若不改,公立大学没出头之日;同时,民办大学的营利性就决定整个办学的赢利特征。不是说民办大学不能营利,是要按《民办教育促进法》来办,办学盈余后才能分利,而不是学费收来就分利。中国独立学院的这种办学营利模式,在世界高等教育中也是极为罕见。如果说转设后的独立学院与民办大学还有机会,那就在于部分公立大学还在衙门化的泥潭中挣扎、一些民办大学还在为利润驱动时,独立学院若能摒除这两个弊端,就有办好一所私立或者说民办大学的机会。否则,除了死亡没有其他。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治理结构、顶层设计的问题。实际上，什么是大学办学特色，首先要看这所大学的资金来源是否多元。公立大学办学资金来源于政府，所以，他们办学只能听部长、省长、市长与教育厅长的。办学经费完全来自学费收入，而且主办方与投资方先分钱再办学。哈佛、斯坦福最大的特色是办学经费的多元化：学费、政府拨款，特别是校友捐赠。办学经费的多元化体现的是一个大学的合理的治理结构，即学校形成了一个理(董)事会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挑战之三，太多独立学院与民办本科院校定位混乱，定位不清，或者定位太高。有的独立学院要办“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中国的哈佛”、“中国的斯坦福”等。其实，独立学院及转设后的民办本科院校就是要办好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为地方培养人才、专业与地方产业，特别是要培养战略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相贴近的专业。而且，这些专业应是学科交叉，跨界发展的，应是由学科与市场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以此来适应业界的混业经营、跨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教育周刊：实践中，独立学院、母体高校各有何制度或政策安排的缺陷？现行政策安排和实践模式，对于独立学院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保障有何不利？

甘德安：要说独立学院的后遗症，主要还是在创办之初没有明晰产权，一些不能达标的独立学院与不准备达标的独立学院因产权问题，必然涉及稳定问题。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还是要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要求公立大学扶持独立学院依法独立。不独立而继续办独立学院的学校貌似混合所有者，后果必然使国有资产流失，学生质量得不到保证。

我在10年前就曾把独立学院分成“翻牌”的独立学院、“卖牌”的独立学院与“创牌”的独立学院三种类型。翻牌的独立学院，或者“名校办民校”的独立学院只有一个股东，就是母校本身，他们没有独立的冲动，上缴“校名管理费”不过是从左腰包掏到右腰包，成为公立大学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类独立学院最大的问题不是独立学院与母校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他们对26号令不是闻风而动，不少可能是无动于衷。

还有一些独立学院创办之初就是“空手套白狼”，或者是“小马拉大车”。十多年来，他们主要是靠学费滚动发展起来的。按照国家法律，学生学费不算民间投资，但这些学费已经沉淀为学校以至公司资产，国家并没有管理这类资产，也

没有这类资产的代理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投资者的资产。这类独立学院转设也难，硬件不达标、师资队伍建设严重滞后，遑论教学质量与办学特色。

教育周刊：独立学院或者民办高校在未来发展中有哪些政策期待？

甘德安：近期，教育部法规司出台了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分类管理的文件。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好文件。但是，从研究型大学到高职、高专之间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一个光谱带，不是要么研究型，要么应用型。应用型也要进一步分为高端应用型、普通应用型、技能应用型。所以说，文件的标准只能是一个必要的指标，而不是一个充分的指标。

应用型也要讲通识教育，在价值观培养方面，在心智健全方面的培养与研究型大学没有区别。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社会正在转型。国家的产业也转向于战略新型产业、高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及市场发展中的混业经营、跨界发展，已经超出文件的思路。为这些新兴产业培养人才，实际上就是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大学分类是对的，大学自身应在分类的指导下寻求自身的定位，在市场竞争中合理找到自身的定位，这是正道。（张惠娟）

——《人民政协报》2014年02月12日

独立学院难“独立”

292 所独立学院“验收大考”被迫延期

“规定的 5 年申请考察验收期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满，全国 315 所独立学院中只有 23 所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另有 8 所独立学院进入转设考察、公示期，约占独立学院总数的 10%。”鉴于这种现实情况，教育部 2013 年 5 月又把独立学院规范验收的最后期限延迟到 2016 年，并要求 292 所独立学院在“十二五”期间的每年第四季度，接受教育部以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考”，即基本符合要求、拟停办与暂缓验收。

据了解，为规范与引导独立学院的改革发展，教育部在 2008 年颁布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教育部 26 号令”），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这部立意与出发点都是好的国家部门法规，为什么签署施行这么多年却执行不下去呢？独立学院深化改革又面临怎样的形势？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产业化”催生大批独立学院

“毫无疑问，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湘潭大学兴湘学院院长刘巨钦说。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 以内就是精英阶段；15%~50% 则属于大众化阶段；超过 50% 就是普及化阶段。对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这个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

据参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工作人员透露，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5%，经过 20 年发展这个指标才增长至 9.1%，而 1997 年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达到 60%。

从 1999 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即全国本专科招生人数 1998 年是 108.36 万，1999 年达到 159.68 万，增长 47.36%；2000 年达到 220.61 万，增长 38.16%；2001 年达到 268.28 万，增长 21.61%。

这一系列令人瞩目数字的背后，存在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严重问题。

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介绍，1999 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改变政府包办教育的状况，鼓励社会力量

以多种形式办学。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浙江大学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创办的浙大城市学院，成为教育部批准的国内第一所独立学院。

“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但是这股风气在地方愈演愈烈，成为一些地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取向。”上述参与决策的工作人员说，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外延性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公开材料显示，到2001年全国独立学院有318所、在校生达186.6万人。

教育部26号令难以扭转一些经济大省的独立学院格局

教育部26令对独立学院的界定是，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普通本科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介绍，该省正式批准成立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是在1998年12月，全省独立学院最高峰达到42所。后来教育部强调要有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才能够举办独立学院，省内规范至26所。

不过，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江苏省除江南大学太湖学院2011年6月按教育部26令转设为无锡太湖学院外，其他25所独立学院的转设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教育部26令施行后，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文（浙教计2009年181号文件）对全省独立学院申请验收工作进行部署：一是对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投资主体规范，2010年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二是对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等7所学院剥离规范，计划在2011年通过验收；三是计划对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等10所迁建规范，2012年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

令人意外的是，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一批独立学院至今未能通过考察验收。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教育部在独立学院规范验收政策要点中明确提出，对普通高校独自举办、普通高校与政府合作、普通高校与中国大陆境外注册的公司合作举办的独立学院不同意验收。

“浙大城市学院办学初期是由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电信集团分别出资 6000 万元、5000 万元启动的，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又通过多种渠道融资 9.6 亿元投入基本建设，很难用教育部 26 号令来简单界定学校的举办者是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说。

据调查，浙江省曾引导独立学院谨慎引入民资，全省 22 所独立学院中有 20 所除了举办的公办学校外没有其他出资人；江苏省 25 所独立学院中有 14 所是国有民营二级学院；湖北省 26 所独立学院中有一半没有出资人。

“基于绝大多数独立学院源于公办校‘独资’的历史原因，甚至在 2003 年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颁布时已基本定局，教育部 26 号令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说。

大部分独立学院难以达到“独立”标准

“对于独立学院的设立及组织活动，教育部 26 号令设置了很多准入门槛与法律责任，但其具体的规定与做法脱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一独立学院院长说。

一位知情者也表示，“某省 15 所独立学院中，只有两所在形式上符合教育部 26 号令要求。以此推算，全国 80%左右独立学院都达不到标准。”

据透露，目前各界争议最大的三条规定分别是：第十二条，独立学院举办者的出资须经依法验资，于筹设期内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本办法施行前资产未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的，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1 年内完成过户工作；第十八条，申请筹设独立学院须提交下列材料（五），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其中包括不少于 500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五十六条，独立学院有资产不按期过户等情形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1 至 3 万元的罚款、减少招生计划或者暂停招生的处罚。

“500 亩土地指标不够实事求是。若按这一标准执行，北京市现有的 5 所独立学院‘达标’都有难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院长李杰表示，对院长而言不要说 500 亩土地，有 1000 亩土地更好，可投资方就不一定同意。何况国外一些知名大学都没有达到 500 亩土地面积。

关于获取土地指标的难度，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长叶国灿深有感触。该院 2009 年就启动异地新建工程，校园规划面积 1120 亩。当地土地“招拍挂”价格达到 300 万元/亩，市政府支持学院建设给予 19 万元/亩，第一年给了 100 亩，第二年 300 亩，第三年 80 亩，第四年 100 亩，其他土地指标还在继续“排队”。

此外，大部分独立学院资产过户迟迟启动不了。教育部独立学院规范验收政策要点中对资产过户的要求是，出资方负责办理过户手续，承担过户过程中的税费。但是，资产增值部分税费问题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涉及国土、税务、财政等部门。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王佐书介绍，目前国内只有黑龙江通过地方立法减免民办高校资产过户费用，其他省份没有放开这个口子。有的独立学院院长向本报记者透露，“省级政府秘书长主持召开多次协调会，但国土、建设、税务部门就是不同意减免。”

中国教育无法回避的“死结”

“教育部 26 号令从法律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合法化，使其成为一种正式的办学模式。但在实际执行中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完成资产过户就无法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变成了‘死结’。”李延保说。

“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至今，我们既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文件，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定位处于不明确状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说出了一个尴尬的现象，浙大城市学院是全国独立学院的典型，教育部 26 号令施行以后，一直没有接受考察验收颁发“准生证”。

“教育部最大的麻烦就是‘26 号令’。”丁晓昌说，教育部在对 26 号令征求意见时，江苏省教育厅明确提出建议。这种事情必须是由国务院牵头，各个部委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等一起来做。

“规定的 5 年申请考察验收期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满，全国 315 所独立学院中只有 23 所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另有 8 所独立学院进入转设考察、公示期，约占独立学院总数的 10%。”鉴于这种现实情况，教育部 2013 年 5 月又把独立学院规范验收的最后期限延迟到 2016 年，并要求 292 所独立学院在“十二五”期间的每年第四季度，接受教育部以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考”，即基本符合要求、拟停办与暂缓验收。

据了解，为规范与引导独立学院的改革发展，教育部在 2008 年颁布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教育部 26 号令”），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这部立意与出发点都是好的国家部门法规，为什么签署施行这么多年却执行不下去呢？独立学院深化改革又面临怎样的形势？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产业化”催生大批独立学院

“毫无疑问，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湘潭大学兴湘学院院长刘巨钦说。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以内就是精英阶段；15%~50%则属于大众化阶段；超过 50%就是普及化阶段。对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这个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

据参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工作人员透露，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5%，经过 20 年发展这个指标才增长至 9.1%，而 1997 年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达到 60%。

从 1999 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即全国本专科招生人数 1998 年是 108.36 万，1999 年达到 159.68 万，增长 47.36%；2000 年达到 220.61 万，增长 38.16%；2001 年达到 268.28 万，增长 21.61%。

这一系列令人瞩目数字的背后，存在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严重问题。

据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介绍，1999 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改变政府包办教育的状况，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浙江大学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创办的浙大城市学院，成为教育部批准的国内第一所独立学院。

“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但是这股风气在地方愈演愈烈，成为一些地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取向。”上述参与决策的工作人员说，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外延性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公开材料显示，到 2001 年全国独立学院有 318 所、在校生达 186.6 万人。

教育部 26 号令难以扭转一些经济大省的独立学院格局

教育部 26 令对独立学院的界定是，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普通本科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介绍，该省正式批准成立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是在 1998 年 12 月，全省独立学院最高峰达到 42 所。后来教育部强调要有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才能够举办独立学院，省内规范至 26 所。

不过，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江苏省除江南大学太湖学院 2011 年 6 月按教育部 26 令转设为无锡太湖学院外，其他 25 所独立学院的转设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教育部 26 令施行后，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文（浙教计 2009 年 181 号文件）对全省独立学院申请验收工作进行部署：一是对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投资主体规范，2010 年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二是对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等 7 所学院剥离规范，计划在 2011 年通过验收；三是计划对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等 10 所迁建规范，2012 年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

令人意外的是，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一批独立学院至今未能通过考察验收。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教育部在独立学院规范验收政策要点中明确提出，对普通高校独自举办、普通高校与政府合作、普通高校与中国大陆境外注册的公司合作举办的独立学院不同意验收。

“浙大城市学院办学初期是由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电信集团分别出资 6000 万元、5000 万元启动的，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又通过多种渠道融资 9.6 亿元投入基本建设，很难用教育部 26 号令来简单界定学校的举办者是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说。

据调查，浙江省曾引导独立学院谨慎引入民资，全省 22 所独立学院中有 20 所除了举办的公办学校外没有其他出资人；江苏省 25 所独立学院中有 14 所是国有民营二级学院；湖北省 26 所独立学院中有一半没有出资人。

“基于绝大多数独立学院源于公办校‘独资’的历史原因，甚至在 2003 年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

见》颁布时已基本定局，教育部 26 号令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说。

大部分独立学院难以达到“独立”标准

“对于独立学院的设立及组织活动，教育部 26 号令设置了很多准入门槛与法律责任，但其具体的规定与做法脱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一独立学院院长说。

一位知情者也表示，“某省 15 所独立学院中，只有两所在形式上符合教育部 26 号令要求。以此推算，全国 80%左右独立学院都达不到标准。”

据透露，目前各界争议最大的三条规定分别是：第十二条，独立学院举办者的出资须经依法验资，于筹设期内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本办法施行前资产未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的，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1 年内完成过户工作；第十八条，申请筹设独立学院须提交下列材料（五），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其中包括不少于 500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五十六条，独立学院有资产不按期过户等情形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1 至 3 万元的罚款、减少招生计划或者暂停招生的处罚。

“500 亩土地指标不够实事求是。若按这一标准执行，北京市现有的 5 所独立学院‘达标’都有难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院长李杰表示，对院长而言不要说 500 亩土地，有 1000 亩土地更好，可投资方就不一定同意。何况国外一些知名大学都没有达到 500 亩土地面积。

关于获取土地指标的难度，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长叶国灿深有感触。该院 2009 年就启动异地新建工程，校园规划面积 1120 亩。当地土地“招拍挂”价格达到 300 万元/亩，市政府支持学院建设给予 19 万元/亩，第一年给了 100 亩，第二年 300 亩，第三年 80 亩，第四年 100 亩，其他土地指标还在继续“排队”。

此外，大部分独立学院资产过户迟迟启动不了。教育部独立学院规范验收政策要点中对资产过户的要求是，出资方负责办理过户手续，承担过户过程中的税费。但是，资产增值部分税费问题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涉及国土、税务、财政等部门。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王佐书介绍，目前国内只有黑龙江通过地方立法减免

民办高校资产过户费用，其他省份没有放开这个口子。有的独立学院院长向本报记者透露，“省级政府秘书长主持召开多次协调会，但国土、建设、税务部门就是不同意减免。”

中国教育无法回避的“死结”

“教育部 26 号令从法律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合法化，使其成为一种正式的办学模式。但在实际执行中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完成资产过户就无法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变成了‘死结’。”李延保说。

“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至今，我们既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文件，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定位处于不明确状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说出了一个尴尬的现象，浙大城市学院是全国独立学院的典型，教育部 26 号令施行以后，一直没有接受考察验收颁发“准生证”。

“教育部最大的麻烦就是‘26 号令’。”丁晓昌说，教育部在对 26 号令征求意见时，江苏省教育厅明确提出建议。这种事情必须是由国务院牵头，各个部委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等一起来做。（《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剑平）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04 月 14 日

“断奶”期至广东独立学院无一单飞

近日，广东工业大学与广工华立学院的纠纷备受学生和家長关注。广东独立学院“单飞”利与弊也再次引发大面积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从1999年在广东成立首家独立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到2012年全省有17家独立学院获得独立颁发学位证书的资格，直到2014年，广东独立学院已走过风雨十五年。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相关规定，2013年是独立学院“断奶”、独立办学的年份，然而，目前广东尚未有一所独立院校真正实现“单飞”。

现在，广东约有30多万独立学院在校生，约占全省本科生的近四成。记者调查发现，对“单飞”的利弊分析，约有半数在校大学生最为担忧的是失去母体名校的“光环”后，找工作会否受影响。而这也是纠结于是否“单飞”的各独立学院最大的心病；另一方面，发展时间短，薄弱的实力，每年上缴数千万的管理费等各种因素也让“习惯依赖”的他们举步维艰，迟迟未能走出母体学校的“哺育”，也难以实现与母体学校的差异化发展。

但是，多位教育专家乃至广东省教育厅负责人均称，虽然“单飞”是独立学院的大势所趋，但目前广东独立学院羽翼未丰，走股份制道路或是正确之选。

发展：“过期”未“单飞” 学院“未断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向记者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独立学院作为教育界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多个省份涌现。和江浙地区相比，起步于1999年的广东独立学院算是比较“晚熟”了。直到2003年4月，教育部颁布8号文，对独立学院发了“准生证”，并对独立学院进行规范，要求做到“五独”——独立校园、独立法人、独立师资、独立财务、独立证书。

2008年，教育部又专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规定2008年以前设立的独立学院，五年内充实办学条件，达到相关要求后，提出考察验收申请，先后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考察验收，考察验收合格的，核发办学许可证。这一《办法》也被称为一众独立学院称为“断奶令”。这也意味着，2013年可能是独立学院真正走向独立的元年。

然而，时至今日，5年“过渡期”已过，但广东的独立学院迟迟未“断奶”。

省内独立学院现状

1. “单飞”在望，已申请等待答复：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2. 筹备“单飞”：中大南方学院，估计一两年内落实

3. “单飞”未遂陷纠纷：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4. 未有“单飞”计划：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汽车学院、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首家“单飞”在望：

“单飞”后母体学校仍予师资支持

华师增城学院开风气之先，迈出了“单飞”的第一步。记者从该学院了解到，该学院欲从独立学院转制为单独建制的民办本科高校，并拟改名为“广州商学院”，申请已上交教育部。在今年1月初，教育部网站前公示2013年审批设置民办本科学校和部分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本科学校名单，这名单包括全国8所独立学院，其中，华师增城学院被列入“专家考察”的序列，并在其官网上予以公示。

华师增城学院副院长高惊生告诉记者，虽然之前该学院的独立申请已上交至教育部，但目前该学院也没有真正、完全独立与“单飞”，很多程序还没有走完，教育部的最终结果还要多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他称，预计到今年3月教育部将会公布结果。

记者了解到，若该学院“单飞”成功，将成为广东省17所独立学院中首家与母体高校完全脱钩的学校。据悉，华师增城学院由康大公司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创办于1998年，1999年开始招生，是广东省第一所新机制民办二级学院。2002年，该校开始招收本科生。2004年，该校经教育部批准成为独立学院。

华师增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刘根正告诉记者，由于该学院长期与华师合作得比较友好，在“单飞”后，母体学校还承诺继续给予师资力量上的支持。

“脱钩”陷纠纷：

学院“单飞”受阻 母体学校称其准备未足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也正打算走独立发展道路,但与其母体学校——广工陷入纠纷中。

近日,华立学院方面通报,向广工提出转设申请,一是由于教育部2008年颁布的《办法》关于“5年过渡期满”的相关规定,二是给予与广工合作办学协议到期事实。该学院称,正式办理转设手续时,广工以种种借口拖延提交时间长达半年,“眼下提交申请截止时间将至,面临自2015年起不能招生和继续办学的严峻局面。”该学院还透露,每年该学院都给广工上缴几千万元的“管理费”,这被广工用于提高教职工福利待遇,该学院希望能把这笔款项用于校园自身建设等方面。

对此,广工一负责人告诉记者,华立学院的通报并非真相。“2008年国家教育部发文要求独立学院投资方一年内要完成把资产过户到学校法人名下,但至今学院都没过户,学院自身没财产,还拿着学校房产全部到银行抵押进行商业投资,这是国家禁止的。”目前,双方还仍未协商一致。

望一两年内“单飞”

中大南方学院在中大支持下“单飞”

创办于2006年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在广东的独立学院中算是一块“名牌”,中大的耀眼“光环”对其招生办学可谓作用巨大。该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今年跟中大合作期满了,希望能在一两年以内争取达到合格验收,实现转设。

该负责人称,近年来,对于广东的独立学院,教育主管部门逐步在放权,在科研和科研项目申报方面、一些国家课题逐步开放,这都有利于独立学院“单飞”。值得一提的是,和华师增城学院类似的是,中大南方学院“单飞”后或许也离不开母体学校的继续支持。“我们正在和中大商议,希望将来中大至少给予我校转设三至五年内过渡期的支持,对教学资源 and 教学指导上的支持。”

合作方式: 每年向母校交2000万~3000万管理费

记者获悉,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目前广东独立学院大多在母校的指导下办学。师资、管理模式均与母校一脉相承。但办学的投入则由企业或商家等投资方投入办学,独立学院则每年从收取的学费中向母体学校上交2000万~3000万不等的管理费。

记者采访众多独立学院负责人了解到，目前绝大部分独立学院每年都要向母体学校上缴“管理费”，其费用一般是占独立学院总学费的 15%~23%，约在两三千万元之间，有些外省独立学院这笔管理费的比例甚至高达 30%。至于省内的独立学院每年上缴至母体学校的经费，一般是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 15%，约为两三千万元。

有知情人士透露，这笔“管理费”成为母体学校教职工福利待遇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部分省属高校体现得比较明显。不过，也有独立学院负责人称，这笔“管理费”是合理的。华农珠江学院院长梁深洪表示，“每个母体学校都需要管理费，这也是资源和品牌投入，背后可能很大部分支持表现在是师资力量上，例如独立学院培养一个正教授、副教授还有一个教学科研梯队，没有母体学校的支持，你能获批吗？”梁深洪称，母体学校办独立学院，最大责任存在于社会责任上，包括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及各方面的管理，“所以应该鼓励飞，但很多独立学院不完全有‘单飞’的能力。”

广大华软软件学院党委书记徐元平则认为，“很多母体学校，如我们的广州大学也并不在乎这一笔费用。”他解释，广大在广大华软里也有股份，“不是强拉着你打我名字你也要给我钱。”

账单：“单飞”少交 2000 万管理费即使招生减 10%仍有赚

如前所述，广东的独立学院绝大部分把每年学费总收入的 15%~23%，约两三千万元作为管理费上交给母体学校。记者以独立学院学费总收入 15%是两千万估算，其学费总收入就是过亿元。假如独立学院“单飞”，省下这两千万元，就相当于多收一千余名学生的学费。

虽然不少独立学院负责人担心失去母体学校“光环”后令其招生受影响，但记者又算了一笔账，假如以独立学院“单飞”后减少 10%的招生计划估算，记者了解到数所名牌独立学院每年招生约在 4500 人左右，那以此估算，大概每年因为这招生减少而损失约 800 多万。这与两千万元多出的经费相比，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

——《信息时报》2014 年 02 月 25 日

图书馆不是用来评估的

“我们已有 300 万册电子书的电子图书馆，可专家们认为这不算图书，他们要求的是纸质图书。”最近，笔者到一所新增本科院校考察，该校负责人告诉我，教育部门对新增本科院校的评估，有一项指标是“生均 100 册纸质图书”，学校有两万学生，达到这一指标要 200 万本图书，但他们根本做不到。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有的本科院校为达到这一指标，到二手书批发市场论斤整车购买，还有的从其他兄弟院校拆借，专家们只管书的册数，不管这些数是否有收藏价值，是否与教育教学有关，学生们是否借阅，反正只有凑够指标，才能过关。为此，高校不得不在这方面浪费大量经费。

其实，对于“生均 100 册纸质图书”这一指标，多年前就有高校领导“炮轰”，但没想到，这一指标在电子书大为发展的今天，还成为各校接受评估的“硬指标”。表面上看，教育部门要求高校重视图书馆建设的初衷不错，可是，强调图书的册数，不强调图书的质量、不关注图书的借阅、使用，结果适得其反。有调查显示，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经调查发现，某高校图书馆新进图书的借阅率在 40%~60%。

高校人才培养和图书馆使用之间的合理关系是，学校重视人才培养，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会对学生提出阅读参考书的要求，学生必须到图书馆（或下载电子书）阅读相关内容，才能跟上课程进度，参与研讨，学生参与课堂研讨的情况，作为课程成绩之一。哈佛大学号称有上百座图书馆，其图书馆的利用率很高，原因在于教师在上每门课时，都提出参考书的要求，一门课要求学生看 10 本参考书，是常有的事。而且，学生不得不看，因为老师要求研讨课上，必须用参考书的内容参与讨论。

我国的很多大学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人才培养和图书馆是脱节的，大学图书馆在很多高校派得最多的用场是作为自修教室。原因在于，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上投入不够，老师对教育教学并不重视，基本还是采取灌输模式，学生仍旧以应试方式学习，只要学期末通过考试即可。这种情况下，就是教育部门硬性规定学校必须配备多少图书，学生使用图书馆的情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要让高校重视图书馆，学生重视阅读、与图书馆为伴，关键在于让老师重视教学，对学生实行严格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拓展学生视野的老师会开出书单，要求学生借阅，学校图书馆必须根据老师的书单准备图书，这样也就形成图书馆建设、使用的良性循环。由此建设起来的图书馆和配备的图书馆藏书，将和学校的教育教学紧密相连，而不是只是一幢供检查、参观的建筑物。与哈佛大学图书馆就分布在学生生活区、宿舍楼下就有图书馆相比，我国大学喜欢把图书馆建设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有的离学生生活区很远，导致学生根本不愿意去。

类似的做法，在我国高校中并不鲜见。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指出，有高校购买六千万元的设备，一次也没有使用，这是极大的浪费。高校购买设备而不使用，与购买图书没人借阅，是一个道理。学校购买设备，是按照上级部门批准的预算购买的，不执行预算是违规，但购来设备，又无处派用场，而且还存在没有维护经费的问题——维护经费没有列入预算——于是设备闲置。以后有人会问，既然设备不用，为何要列入预算？这就要追问负责预算审批者的主导思想了，为防止高校滥用经费，在审批项目预算时，都要求高校提出设备费，而且这要占大头，主管部门的思维是，好歹也可为高校增加一批资产。至于设备究竟派什么用场，不是他们操心的事。

在购买设备这一问题上，合理的逻辑是，由教授们根据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提出购买设备的需求，给教授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而不是由上级部门事先“预算”。为防止经费被滥用、挥霍，要求所有财务信息公开，接受各方监督。

重硬件投入、轻教师作用的发挥，不积极建设软环境，反映出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发展教育的思路还十分粗放，这非但不利于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反而会造成急功近利、形象工程、铺张浪费。从 2012 年起，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达 GDP 的 4.28%，近年来教育投入也持续增加，要让教育投入产生实效，必须改变粗放式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式，积极改善教育的软环境，让教育投入真正发挥作用。（熊丙奇）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03 月 26 日

尊重教育行业 保障教师工资

近日，全国不同地区都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件，严重一点的地方是正常工资几个月不发，还有的拖欠绩效工资，但是，最恶劣的还是克扣工资，比如河南漯河市舞阳县 15 个乡镇的上千教师近日就集体表达了对政府多年来克扣工资的不满。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增长，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其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且每年还有几个月的假期。现在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工资现象的回潮，只是中国一些基层政府财政面临压力的表现，这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以及财政减收有关，是经济下行的产物。

作为事业单位，教育行业并不制造经济上的“产出”，而是财政的完全消费者。而且，教育行业在整个体制内部处于弱势地位，这具体且常常表现在财政方面，比如一些地方财政上向教师乱摊派，财政困难时拖欠教师工资等等。

相关部门可能不认为这属于违反《教师法》的行为，但《教师法》规定教师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的权利，且“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严重妨碍教育教学工作，拖欠教师工资，损害教师合法权益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的经费，并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为地方一些部门会想当然的以为，教师属于体制内的一分子，“拖欠”并非“赖账”，当财政压力小的时候会补发。他们清楚教师没有权力但有体制内身份，因此不会像体制外的群体一样“闹”。但是，在一些基层政府或部门甚至敢于克扣教师工资或者教育资金，他们将教育行业在财政上视为“弹性空间”，其潜台词是，“养着你们，少发一点无所谓，养着你就应该知足了”。

在行政体系内部，存在一种特权意识。比如最近流行公务员抱怨工资低，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理由是，“公务员工资比教师还低”。在一些人看来，教师既没有权力，也不创造 GDP，却比拥有权力的行政系统的工资还高，因此，一些部门的部分人从内心就没有尊重教育行业。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存在“一切向钱看”的导向，很多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

投资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而教育自身也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利性。教育不公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不公最重要的部分。这种不公不仅包括面向学生的教育资源分配差别，还包括对不同地区教育行业投入的多少。事实上，绝大部分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学校都在基层（比如乡镇或农村）或边缘（基础教育和大学之外的学校）。

要想扭转行政部门和社会对教育行业的异化需要漫长的过程，现在，至少需要避免拖欠或克扣工资现象继续发生，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开始减缓的情况下，更应该警惕，防止教师成为受害的群体。关键在于《教师法》对于拖欠教师工资没有明确有效的法律规定，比如“限期归还”、“行政处分”等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违反者本身就是行政上的主管，甚至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人，应该修改《教师法》，对违反法律做出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规定，而不是留给行政部门处理。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4 年 04 月 18

朱清时：在可以范围内，我能做的都做了

■ 对话动机

5年前，南方科技大学在全球200多位候选者中选择了从中国科技大学卸任的朱清时。“把南科大办成一所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这是我的梦想。”在描述“南科之梦”时他信心十足。

今年九月份，朱清时将从南方科技大学退休，结束他的筑梦旅程。

在这5年里，南科大经历了种种风波，朱清时也数次到了风口浪尖。

即将完成任期，朱清时认为这5年南科大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面对的困难远比料想中要多得多，不管经历什么，他的教育之梦从未改变。

■ 对话人物

朱清时 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算是趟出了一条路”

新京报：5年前，南科大被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希望和标杆。这5年对南科大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你自己如何评价南科大这5年？

朱清时：南科大筹建之初就是按照高目标、高水准来筹建的。其实这本身就是突破，按照教育部原本的规定，筹建一所我们预想中的高水平大学不知道要多久。但是南科大建成了，算是趟出了一条路。

新京报：这个高目标、高水准是指？

朱清时：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以及一流的制度。前两者不用说，不管是招聘老师还是招收学生，南科大几年中都坚持了高标准。

制度方面，无论是我国教育中长期规划还是中央文件规定，高校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核心便是去行政化，南科大在这方面一直在探索。

新京报：在这方面探索的主要路径是？

朱清时：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南科大采取的是理事会制度，在西方，理事会制度非常成熟，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

这也是南科大改革创新的关键，他没有走中国传统大学所走过的老路子，南科大采用理事会制度，并且从一建立他就是个法人治理机构，由法人负责。

这5年中，南科大最主要的探索就是理清三者的边界，党委负责什么，理事会负责什么，法人的权力又是什么。

新京报：目前这个边界清晰了吗？

朱清时：基本成形了，但是要高效运转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合。

新京报：年初原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一事曾引发种种猜测，经过这段时间，你们二人的具体分工是怎么样子的？

朱清时：他刚刚来，很多工作才刚刚开展，这个目前不好说。

“成败交给时间去检验”

新京报：有不少人在五年后表现出对南科大改革的失望？

朱清时：南科大从筹建开始就承担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使命，大家有很高的期待是正常的。但是所有事情都非一蹴而就。

新京报：一个对比是，香港在筹建香港科技大学时，1986年9月筹委会第一次开会，1991年正式开学，港科大已初步具备亚洲一流学府的气度。但同样是5年，南科大仿佛没有达到预期？

朱清时：香港的办学环境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个十几年不变的法律在那儿，中间还涉及同政府关系的处理等等。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你之前对南科大目标的描述由5年前的“香港科技大学”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国情下的一流大学”。有这样的声音，朱清时只是在深圳创办了另一所清华北大式的体制内大学，谈不上改革创新？

朱清时：我一直说，香港科技大学是南科大的榜样，这点始终没有变过。至于南科大，他的出生、管理、成长路径等都不同于香港科大，也同中国传统的高校不同，我们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做着各种有益的尝试。

新京报：南科大筹备之初，香港科大三位教授投入其中，但后来三位教授出走，也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

朱清时：对，大家面临的环境不一样。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是理念问题。我也想把一切都弄好了再招生再开展工作，但是我们的条件允许吗？政策在变，政府的态度也在变，我们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南科大。

新京报：边开车边铺轨？

朱清时：对，这种模式是现实决定的。如果我们不招生，不做出一些工作来，

让政府天天给你砸钱？或者照搬一套制度过来，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更顺利？

新京报：你觉得南科大的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朱清时：这个成败要交给时间去检验。在我的心里，如果按照现有的框架执行下去，坚持我们的信念，南科大一定会成为一所一流的高校。

期待继任者坚持最初的基因

新京报：会不会有连任的可能，很多师生对你不舍？

朱清时：这些年承担了很多压力，身体已经透支了，常常睡不好觉，而且年纪也大了，精力跟不上。

新京报：你对继任者有什么样的期待？

朱清时：继任者的人员是由理事会讨论决定的，相应工作会依照程序开展。期待就是能把南科大的改革坚持下去。

新京报：之前你提到，即使离任，南科大也不会“变天”，会健康地运转下去，这份判断的支撑是什么？

朱清时：这5年最为宝贵的突破是，我们给南科大注入了全新的基因，这个基因包括我们的理事会制度，法人治理制度，核心就是学术为先，依靠教育规律办学。我相信，只要秉承延续这个基因，南科大会走出自己的路来。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南科大已经基本做到校内事务更多依靠制度解决而不是人解决吗？

朱清时：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卸任演讲流传很广，他在文中提到很多遗憾和对不起，期望有人去改变。

朱清时：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也提出了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许多高校已经开启了各自的改革。有遗憾就去弥补，这个很正常。

新京报：高校都开启改革，南科大怎么保证优势？

朱清时：南科大是从零开始，相对其他高校算是轻装上阵。我觉得还是那个基因，我期待后来人坚持好最初的基因，那是我们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

我不是悲情英雄，也算不上英雄

新京报：能否用一句话总结你在南科大的5年？

朱清时：南科大的5年，我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在奋斗。5年的时间很短，但也做成了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未尽的理想，还要等将来才实现。

新京报：会有一个期限吗？

朱清时：我的任期将满，这个要看后来人的努力。

新京报：这5年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朱清时：最开心的是学生获奖。我们教改班的孩子有一个参加国家大赛拿了金奖，那个奖一般都是国际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拿，我们一个本科生就拿了。另外一个拿到了牛津的 offer，他们取得成绩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新京报：最遗憾的呢？很多人会说你壮志未酬，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

朱清时：会有，最遗憾的是在我的任期内，南科大的章程没有制定出来，在我的设想里这个章程就是南科大之后运行的准则，因为要权衡方方面面，目前还在制定中。

新京报：上任之初，曾有评论说南科大的改革搞成功了，朱清时就是英雄；即使失败了，朱清时也是悲情英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朱清时：我肯定不是悲情英雄，但也不算上是英雄。在可以的范围内，所有能做的努力我都做了。

新京报：5年前大家可能认为朱清时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你会觉得自己变现实了吗？

朱清时：现实会修正人的很多想法，经历了这5年，我确实变得更实际一些。5年前我意气风发的，觉得理想就在眼前，确实没有想过会经历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对中国的高教改革才有更切实的体会，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以前离得远，你会说我一定要到达那个顶峰。但是真正爬起来才晓得，道路都是迂迂回回的。

但是对我来说，目标没有变，那个山峰一直在那儿。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 单朴 广东深圳报道）

——《新京报》2014年04月04日

俞敏洪：有生之年打造中国最好的民办大学

中新网北京4月10日电(记者 燕磊)10日上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一身商务穿戴，手拿手机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校园内拍摄樱花。身为耿丹学院理事长，俞敏洪一上来就对记者谈办学目标：有生之年，将耿丹学院打造成中国最好的民办大学。

外界一片质疑声 毅然接手耿丹学院

2013年10月9日，俞敏洪在微博上公开表示：“从今年起，接手了一所民办大学耿丹学院，希望用我后半生的精力和资源，打造出一所出色的中国私立大学来。”

驱车100里，用时1个小时左右，就从北京市区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栏山镇为古镇，建于元朝，号称京东八大古镇之一。它的广为人知，则是因为牛栏山二锅头的声名。耿丹学院就坐落于此，是顺义区仅有的一所大学。

耿丹学院院长甘德安研究发现，300年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建在小镇，宁静；近100年，美国的大学大多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耿丹学院为什么好？既在北京，又与北京有着一个小时的距离，它把宁静和大都市的工业化、信息化结合起来了，在宁静之中享受北京现代化城市的利好消息。”

进入耿丹学院的校园，放眼望去，看不到崭新的大楼，几座老旧的建筑，由红色砖块建成，房高层少，像极了北京“798艺术区”的建筑。教学主楼是一座只有两层的楼房，不过其长度却有百米多。每年4月，樱花灿烂，也是校园独特一景。“耿丹学院像美国常春藤大学的风格，红砖、绿化，就是没高楼。”甘德安介绍。

在俞敏洪接手之前，耿丹学院可以说籍籍无名。中国的独立学院总体而言口碑不好，生源、学风广为诟病。这里的学生，与俞敏洪初创新东方时面对的那群为出国拼尽全力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教育界人士普遍不看好俞敏洪的选择。有人指出现在时机不对，在中国整个民办高校衰退、收缩的大背景下办大学，不明智。也有新东方内部人士不看好，称一个三本学院，学生质量太差。

但俞敏洪不这么想，因为创办一所出色的非营利的私立大学，是他多年的梦

想。

接手后大动作不断 办大学梦想终有落脚点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俞敏洪接手耿丹学院，让耿丹学院一夜成名，事实也是如此。但在俞敏洪的心中，之所以接手耿丹学院，是为了让自己办大学的梦想有落脚点。

“我的优势就是教育界和企业界的资源。比如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很多我都能协调调过去。调动全国的企业家进行捐款或者请企业家进校园办讲座，也非难事”，俞敏洪说。

俞敏洪言出必行。耿丹学院 2013 年 9 月开学之后，吸引了诸多知名人士进校园为学生进行义务讲座。2013 年 12 月，来自英国的世界顶级巡演剧团“英国 TNT 剧团”，在听闻俞敏洪接手创办大学后，主动到耿丹学院，为师生表演纯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

俞敏洪接手之后，迅速讨论一个“企业家贫困生资助计划”，整个方案已基本制定完成，将在 2014 年 9 月的新生中实行。该计划的核心是，每年选拔学优家贫 80 名新生，俞敏洪为其找到一一对接的企业家，由企业家捐助学费，并保持每月一次的交流谈话。

至于哪些企业家会参与这个计划，俞敏洪并没有明确的说，只是对记者表示，会尽最大努力找更多的企业家来参与，他自己也会对接 4 到 5 名学生。

俞敏洪对记者表示，正准备成立耿丹学院教育基金会，为耿丹学院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他坦言，创办新东方时并无任何使命感，不过是为了赚一笔钱，然后去美国留学。人到中年，他更是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学院未来定位明确 办学为实现自己理想

交谈中，记者问俞敏洪将以哪所美国的大学为目标。他坦言：“没有目标，因为想追美国想都别想，我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如果能把耿丹学院做成中国私立大学的第一名或者前五名，我觉得就很好了。”

俞敏洪给耿丹学院的定位是出色的私立大学。他所理解的出色是指：为社会贡献力量；学科都奠定基础；毕业生可以找到好工作，甚至走上优秀的领导岗位；教授的科研成果、思想著作被广泛地阅读。

开局不错，并不意味着没有困难。对此，俞敏洪并不惧怕：“中国还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你要开辟出一个真正的领域出来，会有很多艰难困苦。恰恰这种艰难困苦吸引了我，我习惯于面对并征服艰难，从而产生成就感。”

走在校园里，俞敏洪始终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对此，他的“合伙人”徐小平对记者说：“两个数字可以看出耿丹学院的前途，在老俞去演讲前，只有 20% 的学生去阅览室，现在在图书馆都找不到位子了；过去英语课只有 20% 的人上，但新东方老师去了后，教室里坐满了人。”

谈及耿丹学院与新东方的未来，俞敏洪风趣的说：“希望未来可以融合，比如校名可以叫耿丹新东方大学或者新东方耿丹大学。”

而与记者交谈中，俞敏洪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创办中国最好的民办大学”的目标。办学目的是外界追问最多的问题，但在俞敏洪的心里，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实现点儿自己的理想，仅此而已。”

“叛逃”教育工厂

编者按：依托新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教育形式正在“叛逃”传统课堂。推动者们多数不认同“工业化批量生产学生”的传统教育，期望回归教育的本质。这些个体式努力在使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同时，也如“行为艺术”般遭遇非议。

诸如韩寒者是“叛逃”传统教育的少数成功者。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逃”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 1.8 万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一位在家教育者说。

在王晓峰的中式学堂，用神话故事来讲每一个汉字，半年只讲几十个，数学则是在数豆子中建立量和序的感觉，还有一门叫“啊”的手工课。

家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董雯嫣在同学聚会时介绍她的教育理念，结果同学们都不搭理她，觉得她走火入魔了。

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

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北京市回龙观渥丘园，校长办公室里，50 岁出头的王晓峰翻着书，一面看窗外孩子们在泥地里蹦跶。小朋友不时溜进来，一会儿奶声奶气来告状：大车老师大车老师，有人欺负我；一会儿带来一个布艺的小房子要给大车老师看，里边躺着一只初生的小猫。

这里是 R 学堂，一所起始于“在家上学”理念的新型私塾。

近年来，成都蓉榕、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上海的於杨……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案例见诸报端。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于 2013 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 1.8 万人。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条传统教育体制外生存的道路。

“办学校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很快乐，很健康，而不仅仅是考试、学习。”王晓峰说。

王晓峰是 1963 年生人，后来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张冬青是他的同学。

王晓峰的大女儿外向又独立。一路名校上过来，越来越受不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到了高二，扛不住了，要退学。后来大女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闲暇时当背包客。

从老大的成长过程，王晓峰夫妇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一个孩子伤害有多深。

张冬青一直在大学教中文。她感觉学生们学了十几年语文，越学越差。不提理解力、感受力、审美力，“能够文从字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做到这点都不容易了”。

她讲张爱玲的《花雕》，学生就说封建主义、大男子主义。她讲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学生就说是封建主义残余。分析西方小说，他们就说资本主义。

“他们真的已经不会自己思考了。”张冬青一面教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他决定自己教女儿。时至今日，他仍然初心不改：应试教育无视孩子的人格成长，我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我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

成为母亲以后，董雯嫣撇去世相的浮泡，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前世今生，人与自然，人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董雯嫣是1974年生的内蒙古人，自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高分，进名校，从不思考这一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方向。

从北京广播传媒大学毕业后，她做记者和主持人，抢新闻，看资料，有时整宿不睡。这样疯狂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的状态不正常，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她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中外育儿书籍，她全看了一个遍，但愈发困惑。她订杂志。这一期说：生命在于运动。好不容易运动了一个月，第二期杂志又说：生命在于静止。“当场就被打蒙了。”董雯嫣说。

她终于想通：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来自信息。如果没有很完整的独立个体，信息是干扰，不是帮助，它会让人失去中心。

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求佛问道。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 Bonnie。不过，她对教育意义的探寻，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了。

很多年以后的一场咖啡早茶会，当 Bonnie 坐在北京丽都广场的星巴克，吃着帕尼尼，和若干国际幼儿园的妈妈们讨论着中国教育缺憾、双语文化下的均衡发展时，Bonnie 心里想：“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

种一棵树，在孩子脑里

最终，董雯嫣找到了华德福这个概念。

华德福教育始于 1919 年的德国，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基于人智学理论发展起来。人智学理论由基督教教义衍生，吸纳了大量东方哲学元素，是强调人的身体和心灵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如今，华德福学校已遍及世界各大洲，2004 年，第一所中国大陆华德福学校在成都成立。

“从每个孩子出生那天开始，他的灵性就超过了你们所有的成人，然后你保护他的灵性就对了；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给他一些引领。”

思路是一致的：跳到体制外。而不同的父母，又各有倚重。董雯嫣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完整独立的人格和灵魂。王晓峰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各方面都强。Bonnie 则希望孩子能进美国斯坦福大学，她很喜欢商学院的一句校训：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

她建议妈妈们从阅读开始培养孩子。于是 2013 年，Bonnie 创建了一个叫“Readfirst（阅读第一）”的微刊，定期给家长提供书单，推荐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分析国内体制下的一些问题，帮助家长如何去适应以及调整自己。

她经常提起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学会尊重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你周围的人，遵从公共秩序，不要随地吐痰，穿整洁的衣服。这种公民教育中国现在是缺乏的。”

而这时的 Bonnie 也在一家韩国教育集团担任北京总经理。

一次，在首尔的一堂英文文学精读课，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正在精读《海底两万里》。老师要求他们写一篇关于尼莫船长的性格特征，5 分钟即兴写完，然后上台去做演讲。

Bonnie 眼前一亮。美国私校的英文授课模式——培养学生用英文进行创

造性思考、批判思考和逻辑性思考的能力，她感觉这是中国场所缺乏的。从2012年开始，Bonnie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名为Elan（伊莱）的教育模式引入了中国。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发展起来的“英文健身房”。这里全英文环境，像是在中国高楼大厦里的一块飞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海量的英文分级原版图书，在外教辅导下，开始创造性写作和学术写作。比如，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戏剧用的是怎么样的场景？让孩子去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部自己的戏剧。

“就像在孩子的大脑中种一棵英文树，树根就是对孩子的英文进行创造性、批判性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只有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密，吸收的养分越多，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英文读、说、听、写能力’才越甜美。”Bonnie认为。

还能回到体制内吗？

董雯嫣采纳了德国模式，Bonnie移植了美国模式。而王晓峰夫妇的中式学堂，一切从“无”摸起——如何教，全无计划。

王晓峰和家长们先被“在家学习”的方向所困。于是召集了一大拨幼儿园家长。大家坐着开聊，都说现行教育如何不行，大伙当如何如何，但睡一觉，又都没信儿了。到2006年8月底，开学前夕，只余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也要办。便一户贡献一万块，租房子、请老师，张罗了起来。

夫妻俩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语文课貌似最容易解决，“首先是阅读，学认字”。张冬青进修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学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古代历史传说、文化背景、典章制度、宗法继承……半年下来，只讲了几十个字。

“如果孩子一开始认识文字，就从这个角度开始，那多有厚度！”张冬青说。也有人说，这不太难了吗，这是研究生课程。

张冬青答：中国文字有特点，它是象形的，所以甲骨文都是画出来的，这恰恰符合孩子的特点。那背后的典章制度、历史你可以不讲，但神话可以讲。便用讲故事的办法，把字讲给孩子们听。

低年级的语文课，从绘本开始。像是《爱心树》、《猜猜我有多爱你》、《驴小弟变石头》、《活了100万次的猫》。夫妇俩看了绘本都很欢喜，“你会爱上它们

的”。

除了阅读，孩子们还需要经历，王晓峰便会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外地游学，最近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培田古村。

脑子学的东西就是学问，它跟你的身体和心灵没有直接关系。你要随时让孩子的心和他所学的东西关联着。”王晓峰说。

“现在太过重视脑力的开发，忽略了心。”张冬青说。

在现行体制内教育，往往是语数英独统天下。但在这里，事情反了过来。王晓峰二女儿所在的那个班，三年级以前没有正式学数学，“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上这个课。”张冬青笑着说。英语也是后来才补上的，大人没想明白，就先找英文歌英文童谣放给孩子们听，“保持语感”。

后来他们从一本父亲为女儿编写的数学亲子教程中得到了灵感：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牧羊人去放羊，他没有数的概念，如果要知道羊有多少只，就用四个石子摆出羊的四个蹄子，就能代表一只羊了……

大多数时间里，低年级的同学通过数豆子数玉米数棋子来学数学。每个人发一堆，各人数自己有多少颗。然后各种数法，正着数顺了，倒着数。然后各种分，合和分，加乘就是合，减除就是分。

“一年级的孩子数，数几十个就乱了，但这是一种能力，手、脑、嘴、眼、心，对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背后量和序的感觉。”张冬青说。孩子们还玩四巧板、七巧板，搭积木，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几何。其他还有艺术课，美育课，学武术的体育课，还有一门叫“啊”课——就是手工课，孩子们起的名字。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王晓峰夫妇的课堂也从一个三居室，到三个三居室，后来干脆到回龙观渥丘园觅了五亩地，自己盖房。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到这所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小学里。他们给园子里种上竹子，给教室安装PM2.5空气净化器，不断给图书馆送书。

家长们通常会问：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

“没问题呀。”王晓峰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事。也有高年级的孩子转走。王晓峰观察，通常半年时间就能适应过来。至于高考，王晓峰还没想那么远，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也许不排除，组织一个突击冲刺班。

“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

当王晓峰的课堂一点点掘进的时候，Bonnie“阅读第一”的网络粉丝队伍已经迅速壮大到五万多人，北京、上海居多，覆盖全国各地。

不过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困扰——每天白天工作、下午晚上带孩子，凌晨还在更新微刊，快忙得没时间睡觉了。

董雯嫣正在接受为期一年的华德福教育。学校在京郊，倚靠着凤凰岭苍莽的山。下课铃悠然响起，像叩响一口钟。这时孩子们跑出来撒欢，爬树，打乒乓球，把室外的木地板踩得哗哗响。2014年9月，董雯嫣将在这里任职。

前一阵，董雯嫣参加大学的20周年同学聚会，她对身在电台电视台教育台的同学说，给你看看我们学校，你有机会给我们宣传宣传。同学们不搭理她。“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神神叨叨的。”

而面对老同学的各种拉风各种冷落时，她的反应只是：很好玩儿。“我才发现，我比以前有力量了。”

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家长和孩子需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面试，才能确定是否入学。“今年很明显，真的能感觉到一个大潮，有孩子是从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转出来的，好像大家都从体制里往外逃一样。”

去年，董雯嫣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村子里。房东要求长租，她也不多想，直接跟房东一签十年。“我相信这里会有十二年级的，我现在很相信直觉。”

《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基于216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48.60%的家长对在家上学的未来走向非常乐观，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39.66%的家长对在家上学审慎看待，认为只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只有6.15%的家长对其不乐观，对现状担忧；还有5.59%的家长选择“难以说清”。

王晓峰显然属于最乐观的那部分：“其实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它应该就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才有意思。”

说这话的时候，午休的教室里飘出《音乐之声》的原声乐；幼儿园的娃娃在窗帘后头呼呼睡着；一个单眼皮的小男孩趴在《昆虫记》的绘本上，他读到《蝎子：神秘的隐士》；教甲骨文和昆曲的老师正忙着准备南下福建的游学；而窗外，结了队的孩子在秋千上晃荡，在坝里跑啊跳啊，像地里结出一个个野生的孩子。

——《南方周末》2014年04月17日

穿行博物馆 看成都千年

——百座各类博物馆成为蓉城文化地标

安仁古镇上，刘氏庄园与建川博物馆聚落声名鹊起；洛带古镇上，以专题性收藏为特色的博物馆带动了民间技艺的传承；青城山脚下，与自然交融的系列博物馆成为游客的新去处；天府新区里，占地 200 亩的民办博物馆聚落已经成型，集展示展览、研究鉴赏、学术交流、交易拍卖、文化旅游和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密密麻麻的博物馆，穿越了千年成都的街巷。现在，“成都博物馆文化之旅导览图”正在市民中热传。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将博物馆建设作为文化强市的突破口，给政策、给资金、培养人才，各类文物、专项收藏如雨后春笋般从仓库走入展厅，从民间走向大众。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成都已有经过批准、按照标准设立的各类博物馆 109 座，在国内城市中居于前列；其中民办博物馆 67 座，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民办三级博物馆仅有 11 座，成都一地就占了 5 座。

将收藏从仓库中“解放”出来

“对民间收藏家而言，做博物馆是最终的归宿，也是最好的选择。对城市而言，博物馆犹如血脉，是文化品位、软实力乃至竞争力的体现。”成都门里博物馆馆长陈冬如是说

作为有 300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文化遗存丰富，海量的民间收藏成为洞察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但过去，这些收藏大多秘不示人，仅供收藏者自我欣赏或小范围交流，公众无从知晓。“这对文化遗产形成了惊人的浪费！”成都市博物馆协会会长朱树喜直言。

发掘、发现民间收藏，将文物藏品从仓库里“解放”出来，动员全社会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形成文化研究交流与展示的新氛围，是成都这座城市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方式。

经过充分论证，成都市出台了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从政策、资金、信贷、税收、土地使用等多个方面，为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开绿灯，充分激发社会办博物馆的热情。成都制定的博物馆发展规划明确，要用 5 年左右时间建成 100 座博

物馆，其重点在于激活社会力量，形成博物馆发展的“一个中心”“三个群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整合民间资源，建设“成都民办博物馆聚集中心”，形成现代服务业要素配套完善的新型民办博物馆发展示范基地和推进全市民办博物馆集群发展的“龙头”；在近郊的安仁古镇、洛带古镇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青城山建设三大民办博物馆群落。

“太羡慕成都的博物馆了”

去年一年，华通博物馆的参观者超过 10 万人次。这家民办博物馆的藏品多达 5 万件，展厅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有书画艺术、汉陶艺术、青铜文明等 12 个展区。

虽然馆长助理王敏坦言“在宣传、营销、社会服务等方面，与大型国有博物馆还有很大差距”，但成立时间不长的华通博物馆已经获得了“国家三级博物馆”称号。

华通的成功，来自于成都市文化部门及国有大型博物馆的扶持与帮助。2011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的“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在成都试点，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对口帮扶华通博物馆，华通的教育服务、开放管理和工作制度得以优化，员工们到国有博物馆学鉴赏、学展陈，一批专业人才迅速成长。华通博物馆也成为市级青少年教育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了具备国际一流水准的文物检测研究中心，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进一步提升。

“把新博物馆扶上马，把老博物馆做大做强”，是成都发展博物馆业的一贯思路。对于建设规范、发展较快的博物馆，成都市给予专项建设资金支持。2011 年，成都市落实民办博物馆扶持资金 960 万元，2012 年落实资金 1200 万元，去年增长到 2400 万元。收藏名家马未都感叹：“太羡慕成都的博物馆了！”

不仅如此，成都市每年还对博物馆的建设进行评估，针对博物馆馆长开设专业的系统培训班，推动博物馆的正规化建设和不断升级。

传承活态的文明

在成都的博物馆里，可以读懂历史，也可以读懂生活，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可以品味三国故事、杜甫诗歌，可以织蜀锦、品川菜，甚至可以学习川剧“变脸”。更重要的是，每一座博物馆都与过去隔着玻璃看文物不同，观者可以参与其中，体验活态的文明传承。“回归博物馆

最基础的存在价值，就是教育大众和传播良好的价值。”许燎原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许燎原说。

成都蜀锦蜀绣博物馆馆长钟秉章说：“到博物馆来，就知道成都为什么叫锦城，为何有锦江了。”在这家博物馆里，织工们当场织锦织绣，展现成都活的历史，也留住活的技艺。川剧、川茶、水井坊等系列博物馆无不将技艺传承与就业等紧密相连。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项古老技艺的传习所。

华希昆虫博物馆，是我国收藏蝴蝶标本数量最多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昆虫超过 10 万只。但最吸引人的，是人工养殖、精心呵护的昆虫活体。来到这里的孩子们，看到的是刚刚破茧而出的大蝉蛾、处在茧状态下的凤蝶、绅士般的竹节虫，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翻阅最生动的教材。

每到暑假，“关爱留守儿童·奇妙博物馆之旅”公益活动就会启动。如今，有关方面已组织 2000 多名留守儿童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刘氏庄园、杜甫草堂等。同时，由众多博物馆与成都市大中小学共同举办的“博物馆之友”活动也搞得热热闹闹。博物馆将为各学校提供志愿者服务岗位，并且不定期派遣人员到学校为学生介绍博物馆知识，鼓励更多学生走进博物馆，为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延续活力。（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

——《光明日报》2014 年 04 月 11 日